

《佛说化珠保命真经》与 王阳明《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

赵 伟

内容摘要:《大藏新纂卍续藏》收录的《佛说化珠保命真经》，宣扬药王菩萨以法力治愈痘患，极有可能是流传于贵阳周围的一部伪经。经前有王阳明所作的《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失收于各版本的《王文成全书》、《王阳明全集》。序文应该是王阳明被贬贵阳、读到《佛说化珠保命真经》后所作，撰写时间应在正德五年（1510）初至赴三月庐陵县任之前。王阳明在序文中承认《佛说化珠保命真经》对于痘患的治疗作用，并刊刻此经和建立寺庙供奉药王菩萨，这些方面都直接证实了王阳明与佛教之间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佛说化珠保命真经》 王阳明 药王菩萨 痘痘

《大藏新纂卍续藏》收录的第25部经是《佛说化珠保命真经》^①，这部经有可能是一部伪经。本经前有王阳明所作的《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不见收录于各版本的王阳明文集，对于了解王阳明与佛教的关系具有重要帮助。

《佛说化珠保命真经》所宣扬的药王菩萨信仰，应本自《法华经》卷六《药王菩萨本事品》，讲述药王菩萨本生故事。药王菩萨在过去为了“一切众生”，自念“以神力供养于佛，不如以身供养”，遂燃身以供佛。佛说若听闻《药王菩萨本事品》， “能令众生离一切苦，一切病痛，能解一切生死之缚”。又说此品“为阎浮人病之良药”，若人有病，“得闻是经，病即消灭，不老不死”。《法华经》在中国被翻译出来之后，迅速受到中国人的欢迎，六朝时不仅出家僧徒抄写此经，连贵族们也争相抄写，如南朝齐竟陵文宣王萧子良曾抄写《妙法莲华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佛教与明代文学研究”（14BZW062）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佛说化珠保命真经》，《大藏新纂卍续藏经》第1册，河北省佛教协会印行，第415-416页。

经》一部十四卷等。伴随着《法华经》的流传,效仿药王菩萨燃身供佛的药王信仰,在民众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药王菩萨信仰在民众中的流行,最主要的原因是其治病、解脱苦难的功能。在受到民众欢迎的同时,也受到文人们的极大注意。但无论是普通的民众还是具有高知识水平的文人们,都往往将药王菩萨信仰和药师佛信仰混淆,如明末李贽《礼诵药师经毕告文》云:“和尚为幸免病喘,结经谢佛事。念今日是正月十五之望日,九朔望至今日是为已足,九部经于今日是为已完。诵经方至两部,我喘病即减九分;再诵未及四部,我忍口便能斋素。斋素既久,喘病愈痊;喘病既痊,斋素益喜。此非佛力,我安能然?虽讽经众僧虔恪无比,实药王菩萨怜悯重深,和尚不胜礼谢祷告之至。和尚再告:有小僧常通见药师如来即愈我疾,亦便发心,随坛接讽,祈疮口之速合。”^①李贽说诵读佛经使自己的喘病得到治愈,这都是药王菩萨怜悯众生之故。文中提到的药师如来是药师佛,与药王菩萨并不完全一样,药王菩萨信仰和药师佛信仰是有差别的,文中却混而为一。

从内容上看,《药王菩萨保命真经》是世尊为药王、药上二菩萨讲说瘡痘这种疾病发生的原因,因为众生自“无始劫来”,“薰染真性,加以欲气粗浊,精血交媾”,致使“受生之后,真妄搏击,清浊衡衡”,而产生了“瘡痘厚薄诸证(征)”。要治疗好瘡痘,需众生“顿发善心,自悔恶业”,并“香华耀烛,晨夕顶礼,持诵尊佛宝号,及秘密神咒,满一千遍,或五千四千馀遍”,便会有“佛圣降灵”,救病免灾。专为消除瘡痘之疾而造一部经,这在佛教中是很罕见的。经中提到的药王、药上二菩萨,极有可能本自《佛说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此经《大正藏》收录为第1161部,其中但言二菩萨“两手雨一切药,摩洗众生除一切病”^②,并无专门言及瘡痘事。与《药王菩萨保命真经》内容相对的是,在经末有万历己酉(1609)陈宗濠、蔡炳所说的仪式:“凡持此经,切须斋戒,不杀不淫,香灯华水,或设佛像礼念,或当空拜诵(诵)。仍虔具果品,斋供致祭行,珠神甚验。或敦请佛道,代诵亦可。”句末有小注云:“此贵阳相传真诀。”这段话与经文的内容完全吻合,而“此贵阳相传真诀”之语,似乎是说此经只是在贵阳周围流传。《药王菩萨保命真经》不署译者姓名,所以日本连山僧交易评论道:“竺乾之书,不经译而传于兹土者,吾于此经始见焉。新建所谓药王菩萨现世度厄,良有以也。新建于儒可谓杰然者也,尊信此经而刻之序也,则世儒岂可异端而侮之哉?况于奉佛者耶!”^③新建即王阳明。根据交易所言,此经似乎不是翻译过来的,而是中国人自造的。

《佛说化珠保命真经》后,还录有万历己酉福建人王亨仲在重刻《佛说化珠保命真经》时所加的“观世音菩萨稀痘感应塔号”,记录其诵念“大慈悲救

^①李贽:《焚书》卷四,中华书局,1975年,第151页。

^②《佛说药王药上二菩萨经》,《大正藏》第20册,河北佛教协会影印本,第665页。

^③《佛说化珠保命真经》跋,《大藏新纂续藏经》第1册,河北省佛教协会印行,第417页。

苦难稀痘灵感观世音菩萨、唵阿卢勒继娑婆诃”名号,并“五千四千八拜”,向其“请福迎祥消灾锡庆”。王亨仲为何在《佛说化珠保命真经》加了这样一个“观世音菩萨稀痘感应塔号”,使人感到非常奇怪。可能的是,观音菩萨也是东方净土中除日光、月光菩萨二菩萨之外的八大菩萨之一,致使信仰者认为诵念观音菩萨的名号也等同于诵念药王菩萨的名号了。由此可知,《佛说化珠保命真经》中的药王、药上二菩萨,可能被贵阳当地人将其与民间传说中的药王信仰相混淆。《释氏稽古略》中有关于民间药王信仰的记载:“药王,姓韦氏,名古,字老师。疏勒国人。开元二十五年至京,纱巾毳袍,杖藜而行,腰悬数百葫芦,普施药饵。以一黑犬自随,凡有患者,古视之即愈。帝敬礼为药王菩萨,皇后图其形而供养之。”^①对于一个迫切想治好疾病的人来说,很容易将各种相关的神祇混在一起,连李贽这样的文人都将药王菩萨和药师佛混为一谈,更何况一般的民众了。王亨仲所加的这个“观世音菩萨稀痘感应塔号”,说明《佛说化珠保命真经》很可能是在贵阳周围流传的一部伪经。

《佛说化珠保命真经》可能是伪经的另一个证明,是经中“如万川月,非一非多”这句话。“万川月”一语,应出自唐代禅僧玄觉大师的《永嘉证道歌》,歌中说:“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②其中“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是用来说明“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的譬喻。此语后来被禅宗高僧多次引用,如择明禅师引用永嘉“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后解释说:“看看千江竞注,万派争流。若也素善行舟,便谙水脉,可以优游性海,笑傲烟波。其或未然,且归林下坐,更待月明时。”^③择明禅师法嗣汉州无为守缘禅师听宝峰禅师诵“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而“释然开悟”,并进一步阐发云:“以一统万,一月普现一切水。会万归一,一切水月一月摄。展则弥纶法界,收来毫发不存。虽然收展殊途,此事本无异致。但能于根本上著得一只眼,去方见三世诸佛、历代祖师,尽从此中示现。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罗,尽从此中流出。天地日月,万象森罗,尽从此中建立。三界九地,七趣四生,尽从此中出没。百千法门,无量妙义,乃至世间工巧诸技艺,尽现行此事。”^④玄觉禅师的这两句证道歌,不仅为后来的禅师所引用,宋代文人亦经常援引本句之意,如黄庭坚云:“无心万事禅,一月千江水。”^⑤宋代名臣李纲作《普现庵铭》云:“一月普现一切水,水月无尽月惟一。如来普现群生前,化身亿万亦如是。”^⑥更为宋代的理学家所屡屡应用并

①释觉岸:《释氏稽古略》卷三,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玄觉:《永嘉证道歌》,《大正藏》第45册,第396页。

③释普济:《五灯会元》卷十九,中华书局,1984年,第1307页。

④释普济:《五灯会元》卷二十,第1373页。

⑤郑永晓整理:《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第六辑《五祖演禅师真赞》,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30页。

⑥李纲:《梁溪集》卷一四二,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加以变化,如朱熹多次提到这句证道歌,用来说明他“理一分殊”的观念。如有门人问“万物各具一理,而万理同出一源,此所以可推而无不通”时,朱熹说:“近而一身之中,远而八荒之外,微而一草一木之众,莫不各具此理。如此四人在坐,各有这个道理,某不用假借于公,公不用求于某,仲思与廷秀亦不用自相假借。然虽各自有一个理,又却同出于一个理尔。如排数器水相似:这盂也是这样水,那盂也是这样水,各各满足,不待求假于外。然打破放里,却也只是个水。此所以可推而无不通也。所以谓格得多后自能贯通者,只为是一理。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这是那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①真德秀后来曾复述过朱熹的这句话,云:“所以谓格得多后自能贯通者,只谓是一理,释氏曰‘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释氏也’。”^②朱熹在引用这句话时,进行了多种不同的变化。如变化成“月映万川”:“郑问‘理性命章何以下分字?’曰:‘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映万川相似。’”又变化成“如月在天只一而已”,云:“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谓月已分也。”^③而“月映万川”之说,为后来儒者所广泛接受,如明儒薛瑄说:“先儒月映万川之喻,最好喻太极。盖万川总是一月光,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川川各具一月光,物物各具一太极也。其统体之太极,即各具之一本;其各具之太极,即全体之万殊。”^④在禅宗之外的佛经中,罕见“万川月”这样的表述方式,可以推测,《佛说化珠保命真经》中“万川月”这样的表述方式,有可能来自禅宗的说法,甚至是来自朱熹“月映万川”的语言表述。这一点也是《佛说化珠保命真经》可能是伪经的证据之一。

二

王阳明在所作的序文中,也主要是宣讲药王菩萨信仰及药王菩萨的医病功用。序文云:

予谪居贵阳,多病寡欢,日坐小轩,检方书及释典,始得是经阅之。其妙义奥旨,大与虚无之谈异,实余平生所未经见。按方书,诸病之生,可以审证而治。惟瘡痘之种,不见经传,上古未有。间有附会之说,终非的证,治无明验。此经所言,甚详悉可信。且痘之发也,必焚香洁净,戒酒,忌诸恶秽,其机盖与神通云。细察游僧所言,即药王菩萨现世度厄,其曰“吾自乐此”者,药也;曰“急扶我骸”者,急救婴孩也。乃谋之父老,因其废庙而寺之,名其悬筐之石,曰佛筐峰。寺成二年而大兴,疾病祷者立应。予既名还携归,重刻此本,而家藏之,并为之序。正德庚午阳明王守仁识。

①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第十八,中华书局,1984年,第398-399页。

②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卷二二,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四,第2409页。

④薛瑄:《读书录》卷九,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那么,这篇序文是不是王阳明所写?还是有人托王阳明之名而作的呢?

序文后署“正德庚午阳明王守仁识”,这符合王阳明的经历。正德庚午年,即1510年。王阳明于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因反对宦官刘瑾,被杖四十,贬谪至贵阳。在去贵阳的路上,刘瑾“遣人随侦”,王阳明“度不免,乃托言投江以脱之”。王阳明于正德三年春到达贵阳龙场驿。一方面要躲避刘瑾的迫害,一方面对贵阳的环境不太适应,王阳明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年谱》中说:“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魎,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馥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旧无居,始教之范土架木以居。时瑾憾未已,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墀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①据此可知,序文中所记的情况,与王阳明在贵阳的情况是相符的。

据此,序文应该是王阳明在贵阳“检方书及释典”时读到《佛说化珠保命真经》之后所撰写的,并非是他人托名而作。至于写作时间,应在正德五年(1510)初至三月赴庐陵县任之前。

同时,这篇序文体现了王阳明与佛教之间的关系。按照黄宗羲的说法,王阳明曾以朱熹之法格竹,却“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佛、老者久之”^②。王阳明自谓自年幼读书时便对佛、道二教之论有所得,说:“吾亦自幼笃志二氏,自谓既有所得,谓儒者为不足学。其后居夷三载,见得圣人之学若是其简易广大,始自叹悔错用了三十年气力。大抵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③王阳明“叹悔错用了三十年气力”,自然也有对之前钻研佛教的叹悔,从后来对佛教的批评来看,似乎真的十分“叹悔”。如《传习录》卷下论儒、佛云:“佛氏不著相,其实著了相,吾儒著相,其实不著相。”弟子问为什么有此说,王阳明说:“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妇累,却逃了夫妇。都是为个君臣、父子、夫妇著了相,便须逃避。如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仁;有个君臣,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妇的相?”^④这是认为佛教虽然讲不著相,实际却是著了相。又说佛教外人伦:“彼释氏之外人伦,遗物理,而堕于空寂者,固不得谓之明其心矣。”^⑤佛教外弃人伦,王阳明认为反映出的是佛教“一个利己的心”^⑥。综合来看,这些批评都是从社会人伦方面着眼的。

①《年谱一》,载《王阳明全集》卷三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227-1228页。

②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第181页。

③王阳明:《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第36页。

④王阳明:《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第99页。

⑤王阳明:《与夏敦夫》,《王阳明全集》卷五,第179页。

⑥王阳明:《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第26页。

据序文中“惟瘡痘之种,不见经传,上古未有”之语来看,贵阳当时再次爆发大规模的瘡痘之患。从《佛说化珠保命真经》的内容来看,贵阳周围经常发生痘患,经前邢敬作的序文中也表明了这一点。按照邢敬所说,在贵阳爆发痘患时,有游僧以法力治好了痘患。而且在后来痘患重新爆发时,把患儿带到那个游僧曾经住过的庙中,即能将痘患治愈,可谓是非常神奇,此后便以《佛说化珠保命真经》来治疗痘患。王阳明当时因身体不太好,想通过“检方书及释典”寻找合适的方法来消除或减轻自己的病痛,缓解压抑的心理。发现这部《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后,感叹本经“妙义奥旨,大与虚无之谈异”,是他“平生所未经见”。王阳明感叹本经为“平生所未经见”,大概是看到了邢敬所做的序,并按照《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中所说方法医治好了儿童身上的痘患。贵阳当时的痘患,各种方书都没有记载有效的治疗方法。王阳明一定是翻阅各种方书,寻找着治疗痘患的方法,在对痘患的治疗中,看到了《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中所说方法,并根据自己的摸索,配合着药物,治疗儿童的痘患,最终取得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所以他说《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大与虚无之谈异”。序文中说的“必焚香洁净,戒酒,忌诸恶秽”,也与《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中“父母斋戒,不杀不淫,香华耀烛,晨夕顶礼”的说法一致。

痘患的治愈,应该还是药物的作用,王阳明却认为是《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发挥了作用,是“药王菩萨现世度厄”。因为本经所展现出来的良好效果,王阳明不仅重新刊刻此经,而且“谋之父老”,寻一废弃的庙宇而供奉药王菩萨,庙寺建成后,“疾病祷者立应”。在贵阳西南有“药王庙”,为清康熙六年“都司张光焕建,旧为尊经阁地址”^①,不清楚此药王庙是否就是王阳明所建供奉药王菩萨的庙宇。若不是的话,则说明贵阳的药王菩萨信仰是很流行的,这种信仰的流行应与贵州的多疾疫有关。

以法力或奉持、诵读经典便能治愈瘡痘等疾病,宣扬的是宗教的神异化色彩,现在看来是不符合实际的,但从序文来看,王阳明是相信的,如前引连山交易“新建于儒可谓杰然者也,尊信此经而刻之序也”的评论便是说明。因此,从这篇序文的内容来看,王阳明与佛教之关系,并非如《传习录》中所说的“叹悔错用了三十年气力”,而是直接证实了王阳明与佛教之间的密切关系^②,并可以推测它在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发展和成型中可能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作者简介】赵伟,男,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宗教与文学。

①《贵州通志》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关于王阳明与佛教的关系,可参看陈荣捷《王阳明与禅》,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柳存仁《王阳明与佛道二教》,《清华学报》13卷12期,1981年12月。